

宋代的廣州*

徐俊鳴

(地理系)

廣州自秦漢以來已為華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並以海外熱帶特產的集散著稱。到唐宋時期，廣州更成為我國最大的港市，貿易範圍遠達西亞和東非。宋代的國力雖然不及盛唐，但它結束了五代十國割據紛爭的局面，國內的農業和手工業比唐代有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我國南方，由於遭受戰爭的破壞較輕，並有大量人民自北南移，經濟的發展比北方更為迅速，遂使全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

廣州在宋代為廣南東路的治所，管轄的地區相當於現在廣東省的大部和廣西僑族自治區的一小部。宋代廣南東路的人戶為574,286戶，比唐代同一地區的戶數（181,197戶）多逾二倍。

在宋代，對外貿易的稅收在國家經濟上已日益重要，惟當時我國西北方陸上的對外通路，常為敵國所遮斷，因此，宋王朝對於海上交通和貿易的發展特別重視。加之自唐代以來，中外的造船技術日益進步，海上航行加速。以上種種都為廣州都市的繁榮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宋代我國沿海對外貿易的港口，除廣州之外，尚有泉州、明州、杭州、溫州、秀州、密州等地，但廣州設置市舶司為最早，貿易也最盛。當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定平南漢時，就在廣州設置了市舶司來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當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泉州商人要往海外貿易的，仍須經過廣州（見輿地紀勝卷八十九）。泉州設置市舶司是在北宋後期哲宗元祐二年（1079年），後於廣州一百多年。經過南宋期間的長期競爭，廣泉二州迭有盛衰，到南宋末，泉州的對外貿易才得超越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港市。

城市歷史地理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本文主要目的在探索宋代廣州城垣的變化與港市的職能，並由此顯示出宋代在廣州整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

- 本文曾參加廣東地理學會1962年學術討論會，又蒙曹廷藩、鍾衍威等同志提供寶貴的意見，進行過幾次的修改。附圖為李瑩珊同志所清繪，均此致謝。

一 宋代广州三城的范围和职能

唐代广州虽然已很繁荣,但热闹的市区仍多在城垣之外。广州城垣大规模的扩建是在宋代。在两宋三百多年间(960—1279),广州的城垣扩建或修葺了十余次之多,而在北宋期间扩建最大。特别重要的是1045年的加筑子城(即中城)、1070年的修筑东城和1071年的修筑西城。东西相连,规模宏大,号称三城。历元代到明初,才把三城合而为一,从此宋代三城的旧址逐渐模糊,为群众所不了解。但越秀山和番禺学宫(今农民运动讲习所)原在宋城之外,则见于《广州府志》和陆殿邦:《维心享室文集》等书记载,是则宋代广州三城的总范围应比明初所筑的广州城(俗称内城或旧城)为小,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三城各别的范围,则文献资料不多,仅宋人方信孺:《南海百咏》中曾说:“药洲在子城之西址”。元人吴莱:《南海古迹记》中说:“五仙观在子城内”。《黄通志》谓:“清水濠在古行春门外”。(按行春门为宋代子城的东门)。而《光绪广州府志》就根据上述资料来推测:“子城西不尽九曜坊,西南不尽大市街,东不尽广府学(宫),东北不尽小北门”。这种推测,据笔者看来,仅东西两方尚符事实,而东北和西南两方都嫌太远。按小北门乃拓展后的明城的东北界,宋城应在其南。而大市街在今惠福西路,远在今九曜坊(在今教育路)的西南,两地连接起来,西南方成为一畸形的突出,极不合理。据笔者推测,府志作者所以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宋代的五仙观(在今财政厅以西)和明代以后的五仙观(在今惠福西路)混淆了。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八十九中曾指出:斗南楼,十贤堂和清海楼都在子城上,惜未有说明各在子城的哪一方。另据《番禺县志》载:“斗南楼在府治后城上。”按广州府署在今广卫路以北,然则斗南楼当在今越华路一带,即在子城北边的城上。十贤堂在今财政厅以西,当在子城的西边城上。清海楼即后来的拱北楼,在今永汉北路青年文化宫附近,是否在宋代子城的南方城上尚待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宋代广州三城城址的考证,除根据文献资料外,应该辅以城区现在的小地形。按广州城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缘,适在越秀山以南的一片台地上。这片台地的起伏虽然不大,但仍不难辨出有两列岡阜(海拔现约十余米),向南伸入珠江,宛如两个半岛。偏西一列,由三元宫(在广东科学馆后),向南直至坡山(今惠福西路五仙观)。据《乾隆南海县志》载:“坡山…向在江干,相传晋时渡口…山体原非高大,为(南汉)刘龔所凿,竟成培”。现在该处尚有红色砂岩露头可见。这片岡阜可称之为坡山半岛。高聳的花塔和光塔都建筑在这一列岡阜上。偏东的另一列岡阜,可称为番禺半岛,形势比较模糊,因此番山和禺山哪个在南哪个在北,久有争论,但二山相连,绵亘于越秀北路和永汉南路之间,则现仍隐约可见。

在上述两列岡阜之间则为古西湖所在。西湖又称仙湖,中有药洲。唐末南汉曾加开拓,范围颇大,不单包括现今仙湖街、西湖路一带,而且向北伸到华宁里以

北。《白云越秀二山合志》說：“獅子橋在大石街西南雙槐洞，接觀音山（即越秀山）之水，走清風橋（遺址在今中山五路）、七塊石（今華寧里）而出。《廣東新語》則謂：“西湖…其水北接文溪（即甘溪）”。根據這些資料和參酌現在地形看來，則發源于白雲山南麓的甘溪，原來可能是向西南流入古西湖，而非注入東濠。這種推測，除上述《廣東新語》的資料外，尚有以下二點根據：（甲）甘溪和西湖的流向基本一致，而且其間有低地相連，若遇洪潦，這片低地常被淹浸；（乙）甘溪和東濠之間有一陡然的轉折，而且兩側皆為高岡，顯出那段水道系由于人工開凿的。在番禺半島的中部又有一片低地，大致包括今倉邊街、大塘街、長塘街和清水濠一帶，往昔曾為文溪所經，所以明月橋又名文溪（橋遺址在今長塘街北口）。總之，宋代廣州的子城位于番禺半島之上，而以古西湖和文溪（即清代六脈渠中的左一脈和左二脈渠）為東西界綫。子城是在南漢城的基础上加筑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保護官衙，所以特別堅牢，周長五里。宋代最重要的衙門（經略使署）就設在今財政廳的所在，大小馬站為當時駐兵處（見《城坊志》卷二）。

東城是在古越城（即趙佗城）的旧址重建的，周長四里。西接子城，東至番禺學宮以西，已有文獻根據，唯南北界綫不甚明確。茲假定北界在豪賢路以南。豪賢路古稱濠弦街，是濠邊街之意，因該處的北邊往昔有一渠道橫亘。南界暫定與子城齊，即以文明路為界，文明路以南為玉帶濠，大致也和地形相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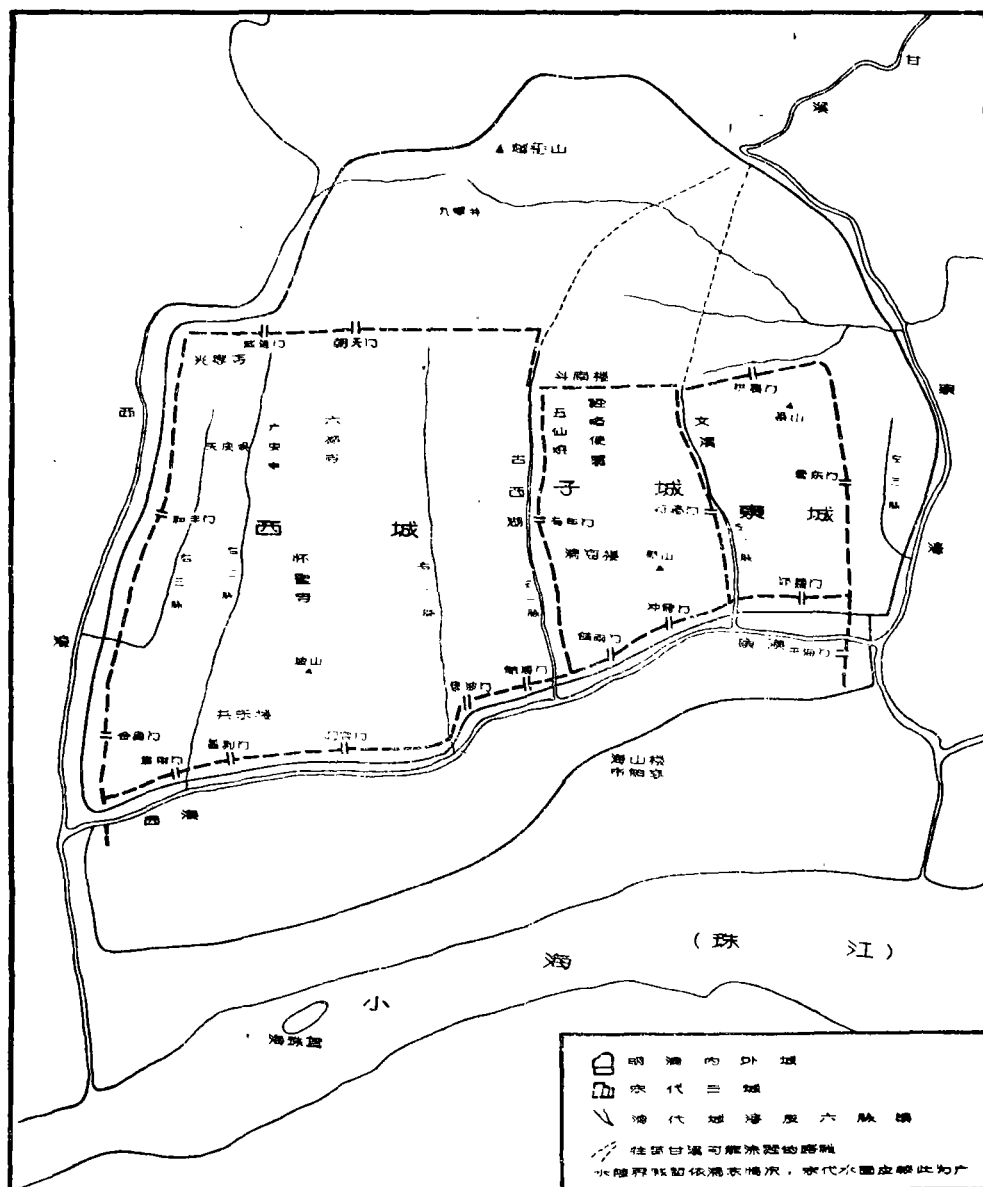
西城範圍最廣，周長十三里余，位于坡山半島之上，東越西湖連接子城，南抵南濠街。今百靈路北有一小巷名北城根，該處地勢較低，諒為西城的北界。惟西城的西界不甚明確，只元人吳萊：《南海古迹記》說：“建德故宅（即今光孝寺）在西城內。”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說：“廣安宅在西城內。”按廣安宅旧址在今旧南海縣街。又明初筑城時，只說曾向東和向北擴展，未言向西和向南擴展，故西城的西界可能和明初的內城西界一致。

西城為“蕃漢大賈巨室”集居的地方，它的作用是保護商業區，所以建議當修西城的時候，居住在廣州的外商曾表示願意捐資助修。自唐代起，廣州已有指定給外人留居的“蕃坊”或“蕃巷”，它的位置大概在今光塔街一帶。光塔所在的懷聖寺據《南海百詠》說是唐時阿拉伯人所創建。光塔街以南有大市街、象牙巷等地，可能是當時漢蕃貿易市場之一。

古代廣州城下的珠江水面較現在為廣，号称“小海”，停泊在江中的商船常受台风的威脅，在北宋真宗年間曾疏浚內濠以供船舶避風之用。宋代廣州城南的東西二澳當属于這類性質。按西澳在西城以南，今南濠街一帶，為當時海舶的主要碼頭，澳邊有共樂樓，樓高五丈，“背倚諸峰，面臨巨海，氣勢雄偉為南州冠。”當時主持修建西城的程師孟有詠共樂樓詩，從這首詩里，可以看出當時廣州的一片繁榮景象。程詩是：“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這里不但概括而形象地描画出宋代廣州城的景況，而且同時指出了當時廣州繁榮的原因：一方由于我國擁有富饒的土地和便于航行的海洋，一方由于有

无数中外人民梯山航海貿迁有无。另据元人陈大震：《南海志》等书指出，西城的西南方有阜财、善利等門，門內有各种税收机关。这些都足以說明宋代西城南面的西澳一带是中外貿易最繁盛的地区。但外国商船在进入西澳之前要先經過檢查和抽稅，这种手續是在子城以南的市舶亭前举行的。据北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談》中

宋代广州三城复原示意图



图一

說：“商船……赴廣州，既至，泊市舶亭下，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凡舶至，帥漕與市舶監官蒞閱其貨而征之，謂之抽解（抽取實物當作商稅）”。關於市舶亭的位置，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應以在子城的南門外為是（筆者另有專文考証，詳羊城晚報1961年11月26日拙作）。市舶亭前有海山樓，極目千里，為登臨之勝。宋時，經略安撫于五月五日在此檢閱水軍（見《南海百詠》）。當時水軍駐扎的五洲究在何處，也隨市舶亭的位置的說法不同而有各種推測。似以海珠島較為合理。

西城的西北方為古蘭湖所在，宋代蘭湖尚未淤塞，據說還可供海船進入。距古蘭湖不遠的天慶觀（其遺址在今海珠北路祝壽巷）和崇報寺（其遺址在舊南海縣衙）都由外商捐款修建，南海縣署也設在那里。

古東澳在東城以南，即今清水濠一帶，北連文溪。現今倉邊街的名稱，就由於宋代曾在这里設置鹽倉而來。按宋代廣州為廣東海鹽最重要的集散地，東澳以北既有鹽倉，東澳當為內河航運的重要碼頭。但東城是曾一度廢置的古越城，其繁榮不及中城和西城，自不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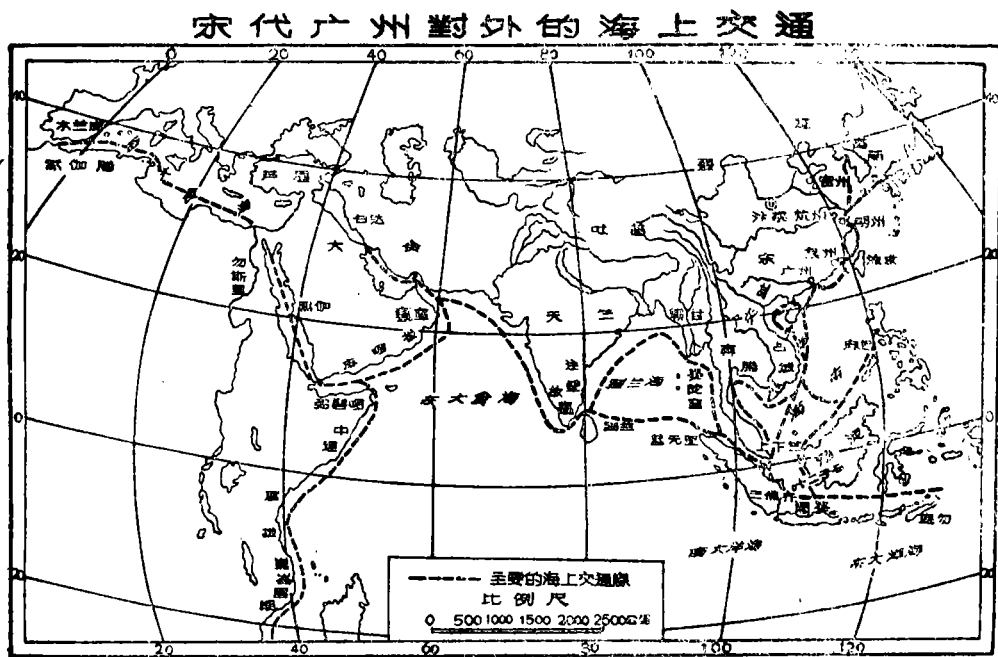
宋代廣州附近還有許多市鎮，據《元丰九域志》記載：南海縣內有大通一鎮，番禺縣內有瑞石、平石、獵德、大水、石門、白田、扶胥七鎮。其中現尚可考的有大通、獵德、石門和扶胥等鎮。而值得特別介紹的是扶胥鎮，它是宋代廣州的外港，位於黃埔以東。那里正當東江北支和流經廣州城下的珠江水道相會并轉向南流的所在。北依小山，南瞰虎門，水面遼闊，俗稱“大海”或“黃木灣”。山上有浴日亭，“扶胥浴日”為宋代羊城八景之一。鎮上有南海神廟，為舟人所福之所，因廟前種有外國傳來的波羅蜜樹，又稱為波羅廟。宋代扶胥鎮相當繁榮，南海神廟建築得非常富麗。宋人楊萬里有詩說：“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南來若不到東廟，西京未覩建章宮。”詩中的東廟即波羅廟，西廟是指廣州城西的另一南海神廟。楊萬里把波羅廟比做西京城里有名的宮殿（建章宮），自然是詩人誇張的說法，但也不難想象宋代扶胥鎮的繁榮景況。到了清代清初期，南海神廟前方已漲沙數十里（見清乾隆時寶光鼐的登浴日亭詩注），扶胥鎮遂因海船不能停泊而逐漸衰落了。

二 宋代廣州的對外交通和貿易

宋代廣州經濟的繁榮雖是多方面的，但以對外貿易的發達關係最大。據《宋會要》職官四四載，宋代通廣州的国家有大食（今伊朗、伊拉克、阿拉伯等地）、闍婆（今印尼爪哇島中部）、三佛齊（今印尼蘇門答臘島巨港一帶）、占城（越南南部和柬埔寨）、勃泥（今加里曼丹島北部）、賓同臘（今越南南部藩朗）、麻逸（今菲律賓明多羅島）、古邏（今馬來半島麻六甲）、沙里亭（今新加坡附近）、丹流眉（馬來半島東岸六坤附近）等國。另據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和趙汝适

的《諸蕃志》等書記載，宋代直接或間接和我国貿易的国家很多，有好些不見于前代的記述，足証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在宋代才开始和我国往来的。

《岭外代答》中指出：“諸蕃之富盛多宝貨者，莫如大食国，其次是閩婆，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諸国耳。”同书又叙述了各国来华的航綫：“三佛齐国者諸国往来海道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即竺屿，今馬來半島东南方的小島）与交洋（即交趾灣），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門（今九龍半島青山附近），欲至泉者，入自甲子門（今广东陆丰甲子）。閩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加里曼开島以西的卡利馬塔群島），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今印度西南端），易大舟而来行，至三佛齐，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至于各国往来我国所需的时间，該书指出：“諸蕃之国。一岁可返，惟大食必二年而后。……若夫默加国（今阿拉伯半島上的麦加）、勿斯里（今阿联开罗），其远边不知其几万里矣。”



图二

当北宋时，还有些本来可循西北陆道到首都汴梁的国家，宋王朝也规定它要由海道到广州登陆。

宋代我国的主要出口貨物有金、銀、銅、鉛、錫、鉄等器物、瓷器、綢帛、漆器、茶叶、酒等。按宋代在今广东省范围内，采矿事业特别发达。据不完全统计，产金的六处，产銀的二十八处，产銅的四处，产鉛的七处，产錫的九处，产鉄的九处。

大规模鑄造銅錢的有韶州和惠州两处。（參看地理學資料第七期中拙著《宋代廣東經濟地理的初步研究》一文）。這些金屬的采冶為廣州各種金屬制品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從廣州出口的貨物，自不限於廣東境內所產，例如綢帛、漆器和茶葉等物可能有一部分來自遠方。此外，宋代我國有大量銅錢的流出，原因並不一定由於我們對外貿易的入超，而主要是和我國通商的許多國家缺乏銅礦和喜愛我國銅錢。因為“蕃夷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見《宋會要》刑法二）。甚至有些國家以我國銅錢作為該國的通用貨幣。在南洋和東非等地都迭有我國銅錢的發現。

宋代外國輸入我國的貨物有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璣、鎖鉄（精鉄）、檳皮、瑇瑁（玳瑁）、瑪瑙、車渠（巨蚌）、水晶、蕃布、烏婪木、蘇木（紅色染料）等。其中以乳香和藥材最為重要，乳香的主要產地為大食國，據陳敬所著的《香譜》稱：“大食以舟載（香）易貨于三佛齊，三佛齊每歲以大船至廣與泉，廣泉二船視香之多少為殿最。”當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由廣州入口的乳香曾占全國總輸入的98%，故乳香稱為“廣東香”或“嶺南香”。進口的藥材有沒藥、阿魏、芦荟、無名異、葫芦巴等，因它們多以海道經廣州入口，故稱為“海藥”或“廣藥”。

宋代廣州的對外關係，並不局限於經濟一方，同時又是中外使節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門戶。史學家已有專文論述，茲不多贅（參看郭威白著論廣州在宋代對外關係中的作用，載《學術研究》1962年6期）。

三 宋代廣州的對內交通和貿易

宋代廣州不特對外交通貿易很發達，而對內交通貿易也很興盛。由外國進的香藥珠寶常循水陸不同的路線運銷國內各大城市。蘇過在《斜川集》中所謂：

“犀、象、珠、玉走于四方。”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也說：“中州（今河南）人士但用廣州舶上占城、真腊等香。”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又說：“閩粵之貨乘風航海不以為險，故珍貨遠物畢集于吳（今蘇州）之市。”長江流域的成都、鄂州（今武漢）、潭州（今長沙）都有由廣州轉口的香藥出售。據《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記元祐三年（1088年）有：“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今山東）、河北、河東（今山西）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樵，未能欺隱。”北宋時，外國進口的珍寶奇貨甚至還由汴梁轉運到遼、夏等國去販賣。

宋代的廣州又是廣南米糧和食鹽的重要集散地。珠江三角洲修筑堤圍最早的紀錄是北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由於對低地的開發利用，宋代廣南的糧食生產有顯著的增加，因此，廣州就成為一大米市，有餘糧運銷閩浙等地。南宋朱熹指出：“廣南是最多米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唯有廣東船米可到泉

福。”（分见《朱文公文集》卷二五和二九）。南宋真德秀也指出：“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见《真文忠文集》卷一五）。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粿广米赴行在（杭州）。”（见《宋史》卷三五），这些都是南宋前期的记载。

宋代，盐税已为国家重要税源之一。广南东西两路所产的海盐常占全国总量十分之一左右，其中大部分先集中于广州，再由东江、北江和西江转输内地消费，甚至有一部远销五岭以北。因此，北江和梅岑道上舟车络绎，转运海盐和进口货物极为繁忙。北江中流多峡谷险滩，北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曾从英州（今英德）大源洞伐山开道直抵曲江（见郭棐：《粤大记》）。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更在真阳峡（俗称盲仔峡）西岸开凿山坡架设栈道，使英德和清远间的交通大为改善（见《宋史》卷三三三）。嘉祐八年（1063年）又修治大庾岭山道，两旁遍植青松和红梅，泉流涓涓，绿阴处处，上下三十里，行人若在堂宇间（见《宋史》卷三二八蔡挺传）。

此外，海南岛上出产的热带特产也运到广州来。特别是槟榔竟成为广州人不可缺少的嗜好品，“不论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吃饭，唯嗜槟榔。”而广南西路（今广西）的粮米也“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网市利。”（均见《岭外代答》）。当时北江至广州的航线，不象现在必须绕行三水，而可由芦苞水道逕趋广州，西江的航线也可以从西南水道东来，二者在官窑附近相会，所以官窑是当时广州西北方的水运要地，人烟稠密。官窑附近的灵洲俗称小金山，山上有宝陀寺，宋人苏东坡路过此地，曾有题咏。

四 宋代广州的手工业

宋代由于国内农业生产的增加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手工业也比前发达。当时广州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类：

（1）纺织 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宋代广州的纺织品有蕉布和竹布等。而棉纺织的兴起最值得注意。我国本不产棉花，外国棉花的传入我国大概有三条路线：一由中亚经过新疆、甘肃传入华北，二由印缅传入云南，三由海道传入闽广。所以广州是我国棉纺织兴起较早的地区之一。南宋人方勺在《泊宅篇》卷三一中指出：“闽广多种木棉（按即棉花），纺织为布、名曰吉贝。”宋人王明清在《玉照新志》中还记载着北宋神宗元丰初年，有一位广州地方官吏曾包纵广州军人织造木棉牟利而获罪，料想其经营规模已经不小。宋代广州丝织，史书虽未论及，但唐代广州的丝绸已列为贡品，明清广州丝织也极兴盛，宋代当不会完全中断。

（2）造船 造船虽无正面材料，但《岭外代答》中曾提到，宋代航行南海的有一种大海船，名叫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这种船虽未明言何处所造，但同书却又提到

欽州(在广东西部)沿海出产一种优良的木材(烏婪木),可以制造海船的巨舵,这种木材运到广州可以获利十倍,是則隱示广州有制造大海船的能力。《宋会要》食貨卷五〇則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詔罢广东福建造船。”是則在此以前,广东有造船意在言外,这一詔令可能只是一种临时措施。未必是长久这样,而且所罢的也是官营造船,民营自可依旧发展。又日人桑原鷗藏在《蒲寿庚考》中也說到,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日精,唐代中国前往印度的僧侶多乘外国船,但自唐末五代間,东来的阿拉伯人已多乘中国船,到了宋元,外国人乘中国船的就更多了。宋代广州既为我国最大的港市,按理应有一定的造船能力。

(3)金属器物制造 宋代广州出口的金多為手工业制品,据《宋史》地理志,密邇广州的番禺县境就有銀炉和鉄场。宋以前的南汉,广州的銅鉄匠已能用銅鉄为南汉主鑄造肖象和塔。《續通鑑長編》卷一一五指出,在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广南蕃舶多毀錢鑄銅器。”宋代由广州出口的銅器有銅钟和銅瓦等物。《宋会要》蕃夷四記載有大食国王在广州购买銅钟的事。宋人樓鑰在《攻媿集》卷八六有:“三佛齐請就郡鑄銅瓦三万斤,舶司得旨,令泉广二州守臣監造付之。”当时海外各国常向我国大量购买銅钟、銅瓦,实非尽需此物,仅借以套购我国的銅矿而已。《宋会要》蕃夷四又載南宋高宗紹興四年(1134年),“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将进貢回賜到錢置大銀六百錠及金銀器物匹帛。”

(4)陶瓷 陶瓷是宋代我国重要出口品之一,据《萍州可談》卷二指出。当时(北宋)由广州往海外的船中,“貨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上文所說的陶器可能包括瓷器在內。由于出口的需要自然促进广州及其邻近地区陶瓷工业的发展。解放后,在广州西村皇帝岡等地,发现宋代瓷窑遗址。离广州不远的石湾的陶瓷工业据說宋代已經有了。

(5)制糖和酿酒 甘蔗是热带作物,最先传入閩广,所以广州也是制糖工业发展得較早的地区之一。《宋史》地理志中已指出,糖霜已是宋代广州貢品之一,宋人王灼的《糖霜譜》一书也說宋代广州是我国产糖地区之一。宋代的酒一般由政府經營专卖,但岭南却允許民营,所以称为“万户酒”,且有用荔枝等岭南佳果酿造的特別香醇。

(6)制香和香水 广州由于有海外传入的香花和輸入的香水,当地人就利用这些原料来加工制造綫香(有龙涎香、心字香、瓊香等)和香水(假薔薇水)。这些制品远銷國內各地,极为有名。宋人洪迈在《夷堅志》丁集卷九中指出当时临安(杭州)有人仿广州造的龙涎香。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有关心字香和瓊香的制法,略謂以佳沉香薄片和半开的素馨茉莉花层层相間,放入密封器內,使香水吸收花香而更加馥郁。宋蔡條的《欽定山房叢談》中指出广州人仿外国制薔薇水,因不能得薔薇花而代以素馨茉莉,虽然不及大食国所制的真薔薇水,但也极为芳香。

小 結

宋代(960年—1279)是广州古代都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那时广州不特是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在这期间,城垣曾一再扩建,中、东、西三城相连,规模宏大,气象万千。亚洲和东非各国的使节和商人往来频繁,中外珍贵商品大量由此集散。宋代广州发展特快的原因有三:(1)当时我国北方受战争的破坏较大,全国经济重心南移,(2)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此时开始筑堤利用低地,使广州成为当时我国的重要米市。(3)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造船技术也有进步。

在宋代的三百余年間,广州的发展也有变化,大概前期发展较快,自北宋末期,有福建的泉州起而竞争,至南宋末及元初,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泉州,但广州仍不失为珠江流域最大的港市。

Canton in the Sung Dynasty

Hsu Chun-ming

The period of the Sung Dynasty(960-1279)wa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anton. Canton was then not only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re of Southern China,but also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ommercial port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ity wall of Canton was extended and repaired more than ten times;the“middle”,the“east”and the“west”city were enclosed in 1045,1070 and 1071,respectively. The city consequently extended of several times its size in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via Canton that spices, medicines, jewelry, etc.from Southeast Asia, India, West Asia and East Africa flowed into the interior of China;and,it was also through Canton that fine silk and porcelain,gold,silver and copper coins were expor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Canton was also China's biggest rice market in the Sung Dynasty: the grain of the Pearl River Valley poured into Canton to be re-shipped to Fukien and Chekiang.

Three causes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Canton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1)Northern China was severely ravaged by war, whereas Southern China was relatively peaceful. Many people fl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economic centre of the country

shifted accordingly. This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nterland of Canton. (2) The construction of dikes to enclose the lowland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began at this time, gave an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round Canton's outskirts. (3) China's ship-building beca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mpass was applied to navigation, and both facilitated oceanic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 lands.

Canton's development was more rapid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Sung Dynasty. Toward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orthern Sung, Chuanchow, in Fukien, began to compete with Canton so that the centre of foreign trade was shifted in the course of time to Chuanchow, Canton, however, remained the biggest city in the Pearl River Valley.